

54封家书背后的红色爱情

徐佳佳

文人逸事

胡适批“麻将”

周惠斌

胡适早年热衷打麻将，而且牌瘾颇大。1911年七八月份，胡适正在美国留学，他在日记中曾记录了自己的“麻将生活”：周一注册学籍并打牌，周二上化学课并打牌，周三上课并打牌……若是遇上休息日，更是通宵达旦打麻将，耗费了大量宝贵的读书时间。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如此堕落……”

1926年7月，胡适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他从北京出发，经哈尔滨、西伯利亚，抵达欧洲。会议结束后，由美洲到日本最后回国，前后历时10个月。胡适一路游历，将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一篇文章《漫游感想》，其中，第6为“麻将”。胡适落笔便指出，1920年代初，麻将风靡欧美，成为西方社会最时髦的一种游戏：“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将，书店里出了许多研究麻将的小册子，中国留学生没有钱的可以靠教麻将吃饭挣钱。”

然而，此番游历除了“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个俱乐部里看见有人打麻将牌，在欧美简直看不见麻将了”，胡适惊奇地发现，麻将已成了西方人“架上的古玩”，鲜有人问津。他不由得感慨：“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进而痛言：“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消闲，女人以打麻将当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当下半生的大事！”

《漫游感想》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尤其是“麻将”一则中，胡适在言语之间让我们看到他到国人身上长期存在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消闲之态。感痛切，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国粹”麻将的深恶痛绝，以及渴望重建东方文明的迫切愿望。

钱穆上课

王剑

著名史学家钱穆给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都讲过课。他的课堂精彩纷呈，时有妙语，常常逗得学生笑声不断。

有一次，他给小学生上作文课，强调“作文就是说话，口中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并出了作文题目《今天的午饭》，学生交上来之后，钱穆认为有一篇写得比较好：“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以此为例，告诉学生作文要曲折、要有韵味。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就很有意思，有了它，作文则显得与众不同。

后来，钱穆到北京大学讲中国通史。讲课时，他穿一件发旧但干净的蓝色长袍，喜欢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钱穆善于言辞，

长于演讲，讲到紧要处，像与人争论一样，高举双臂，慷慨激昂；讲到高兴处，又巧妙譬喻，妙语连连。比如讲到中西文化的异同时，他将秦汉文化比喻成室内遍悬的万盏明灯，即便打碎一盏，其余犹亮；而将罗马文化比作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对于这样的比喻，学生听得进记得住。

由于听钱穆讲课的人太多，学校不得不将他的课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3倍。每一堂课，听讲者将近300人，坐立皆满。更为夸张的是在西南联大时，钱穆上课的时候，教室过道都挤满了学生。钱穆“无路可走”，需要踩着学生的课桌才能走到讲台上。而在香港新亚学院时期，每当有钱穆的讲座，校内外来听课的学子人满为患，钱穆必须拨开人群，“开辟道路”，才能上台讲课。

谢国桢藏书

方庆东

史学家谢国桢一生俭朴、爱好藏书。他署其书斋曰“瓜蒂庵”，意指在收藏一些善本古籍过程中，善本书籍、佳名钞，他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篇断羽的东西，好比买瓜拾些瓜蒂而已。晚年还写过一首自述诗：“重隆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浪掷年华虚岁月，拾得瓜蒂结瓜成。”

谢国桢每月收入的三成作为膳宿杂用，七成则花在买书上。北京琉璃厂东街是谢国桢去得最多的地方，哪怕晚年行动不便，也要隔段时间去那里的古籍书店转转，阅读访书、打听行情。对书籍近乎痴狂的热爱，在他众多的书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每当发现珍稀史料，即使囊中羞涩，也会想方设法将其收入囊中，那种得书后的喜悦，足以让他的“老眼犹明”，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学术的热忱，跃然纸上。

1979年，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日益不佳，谢国桢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致信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表达了无偿捐献个人藏书的心愿。这些藏书包括明清笔记、别集杂史以及汉晋碑帖、砖瓦拓片等珍贵史料，是谢国桢毕生心血的结晶。在他看来，这些图书不应为人人所有，而应成为“天下公器”，供后世研究利用，让学术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心灵。

1981年，谢国桢更进一步将获得的3万元奖金全部捐出，用于增购书籍资料，旨在促进明清史研究，使之成为该领域的资料中心。1982年，谢国桢离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别设立“谢氏瓜蒂庵藏书室”，以纪念这位学术巨擘。

赵树理命名“曲艺”

夏明亮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大会主要筹备负责人之一周扬指示赵树理，将曲艺的、卖艺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筹建一个有关这方面的艺术团体。于是，赵树理召集老说唱家王尊三和热衷于民间艺术的作家苗培时、诗人王亚平在一起讨论此事。

在讨论中，他们一一列举这些艺术形式：说书的、说相声的、说大鼓的、说评弹的、说快板的、说数来宝的、说山东快书的、打莲花落的之类，习惯上都称为曲艺的；要把戏的、拉洋片的、搞杂耍的、街头卖艺之类，习惯于都称为卖艺的。这些民间艺术五花八门，虽然不上大雅之堂，但却得到老百姓的特别喜爱。

要成立艺术团体，就必须给这些艺术形式取一个统一的名称。他们四个人讨论了半天，也没有达成一致。最后，还是赵树理说：我看这样吧，咱们要组织的这个艺术团体，既然大

多是唱曲的、卖艺的参加，那就叫“中国曲艺研究筹备会”吧。大家一听，齐声叫好，觉得“曲艺”这个名称真是贴切极了。

1950年1月，在赵树理的推动下，曲艺刊物《说说唱唱》问世，赵树理、李伯钊出任主编。不久，作家老舍回国，赵树理提议老舍担任主编，他和李伯钊为副主编。1957年1月，赵树理又创办了大型刊物《曲艺》并担任主编。

1953年9月，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王尊三出任主席，赵树理担任副主席。1958年8月，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前身）成立，赵树理被推举为第一任主席。

赵树理不仅在曲艺的组织和曲艺刊物的创办上殚精竭虑，还创作了许多曲艺作品。据学者一丁说：“据不完全统计（实际上无法完全统计），赵树理同志一生写的曲艺数目要多于小说数目，约有100个（现在见于文字的则不足二分之一）。”



▲一九二三年陈毅安与李志强的合影

陈毅安1905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接受马克思主义后，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陈毅安在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等军事活动，逐渐成长为党早期高级军事将领。1930年，陈毅安在长沙战役中牺牲。

回首陈毅安的一生，除了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不断努力外，他与妻子李志强之间誓死不渝的红色爱情同样令人动容。1922年至1927年间陈毅安写给李志强的54封家书，以及1930年陈毅安临死前留给李志强的两张无字信笺，就是这段荡气回肠的红色爱情的重要见证。

自由恋爱

1920年，陈毅安来到湖南长沙求学。学习时期，包括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在内的各种新思想被广泛传播。陈毅安受此影响，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追求自由恋爱的种子。

1922年，陈毅安去看望自己曾经就读过的长沙县临湘镇书堂山第一高级小学的语文老师邹老师。两人交谈过程中，陈毅安认识了邹老师的外甥女李志强。陈毅安与李志强年龄相仿，谈心、聊天、接触后，两人互生好感。

拜别老师，陈毅安回乡看望家人。当时，陈毅安的伯母提出要为他结亲。陈毅安答应了伯母的提议，但要求结亲的对象由自己找。

他心目中的伴侣就是李志强。为此，他再次找到邹老师，表达了自己希望与李志强结为夫妻的愿望。由于两位年轻人早已情投意合，邹老师就破媒，让陈毅安与李志强订婚。

订婚后的，陈毅安继续回学校完成学业，而李志强则留在老家读书。分隔两地的二人，只能靠书信维持联系。在这期间，李志强的母亲等人经常用男女婚前不应过多往来的旧规矩，劝李志强与陈毅安少来往，以免被周遭的人说闲话。这些劝导增加了李志强与陈毅安交往过程中的心理负担。

了解情况之后，陈毅安一方面通过书信鼓励李志强学习和接受新婚姻观，鼓励她摆脱女子深居闺阁，不问世事的传统观念，勇敢走出家门，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成为一位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1922年4月26日，他在写给李志强的信中就提到：“现在社会非往日可比，不得以深处闺门不问旁的事者为好。凡女子必定要尽他（她）天职，要社交公开，何况我们有特别的关系呢！”

另一方面，陈毅安安慰李志强，强调两人的恋爱是光明正大的，让她不需要太在意旧传统。1922年9月12日，陈毅安在给李志强的信中指出：“老母平日对余非常慈善，今日用此专制手段者，因我你订婚，是我自主，夺其教导婚配之权，故心大不平也。然事已定好，且我你相爱以心，光明正大，岂效世间齟齬男女所为，

怕人议论耶？”1922年11月15日，陈毅安又在给李志强的信中，强调社会风气已经变了，两人行为是合乎社会规范的：“我虽幼稚，已授充分家庭教育矣！尚授学校教育有年，虽学识全无，岂礼义廉耻四字都不能了解于心耶？总之，你有百年偕老之关系，无丝毫不当的行为。”

这些慰藉，让李志强看到了陈毅安的担当和磊落，因此更加坚定要与他走到一起。

结为伉俪

确定关系后，陈毅安与李志强的书信往来更多了，话题也从反抗旧式婚姻到追求进步，投身革命。

对此，陈毅安经常鼓励李志强学习新文化。1922年9月12日，陈毅安在给李志强的信中，就劝她投考长沙的学校：“请你速急来省，投考学校，以全余之志愿，不然恐永无集首成欢之日矣！你当三复思之。”1923年1月9日，陈毅安又信中催促李志强，希望她下定报考的决心，期待她以后能够有一番成就：“第一女师在寅历十八招考，为妹求学之好机会。你能如时前往投考否？若不能应考，则无尚学之志，你之大名‘志强’，当解为‘志弱’也。我之望你求学，是解决你本身问题，与我无甚关系。你当知我之意，努力学业，为自身谋福，为女界争光。”

在陈毅安的鼓励下，李志强日夜苦学，不久就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而为了让李志强安心学习，不为钱财和感情影响，陈毅安一边经常将自己的生活费寄给她。1926年4月4日，陈毅安在给李志强的信中说：“十几号又寄了八块钱给你。”并询问：“你现在经济问题如何？如要钱时可早些预算，我好再设法，万不可不说，整什么志气？”“我寄些书报，你也看过没有？如若不看，那就免得我费手续费邮

花。你只管发奋读书做工作，也不必挂念我。”

另一边，陈毅安又常常诉说自己对爱情的忠贞：“我们终日同性的交际，断不至做不道德的事，不过我讲的一些话，是要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意思。你听了我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存丝毫的意见，并且希望你要把爱情更加坚固，大炮都是不能裂的。”

陈毅安在与李志强的书信往来中，逐渐坚定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在长沙学习时，陈毅安就经常告诉李志强，自己接触新思想后，精神上有了很大转变。1922年11月4日，陈毅安就通过书信告诉李志强自己在甲工学习后的改变和进步：“前日接到常兄给我一封信，说我有打牌吸烟种种坏习惯，痛骂我一顿，使我有受了这样大的刺激，知道要痛改前非，已由黑暗的地方到了光明的位置，污秽的脑海已用泪洗滌清洁了。”

1925年1月，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后，陈毅安在信中则告诉李志强，自己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同学有万余人，中国各省都有，就是蒙古（国）、朝鲜、印度、安南、南洋群岛各属也有少数人是我们的同学。这个地方可说是东方的觉悟青年的集中点了。”伴随着学习和与同学们交往的深入，陈毅安逐渐认识到自己缺少做实际工作的经验，希望在革命中找到人生价值：“你从前说学生天天在街上喊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没有做一点实际工作。我现在实行学一种技术，学好之后，来实行我之所学。”

此外，在书信往来过程中，陈毅安还认识到真正的伴侣还应当是志同道合的，是能够支持他的革命理想的：“我希望你要做我的一个同志，才算是我真正爱的人。”为此，陈毅安还引导李志强阅读革命书籍：“我希望你要研究主义，勿读死书，学了学问是要拿到社会去应用的，不然虽是个专门学家，也是没一点用的了。并且要把眼光看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陈毅安寄给李志强的信。

些，我们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从前门户未开的一样，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些倾心交谈，让陈毅安与李志强的爱情克服了千山万水的阻隔，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并进而促成了他们的婚姻。1929年3月，在战斗中负伤的陈毅安返回湖南湘阴，同年10月陈毅安与李志强完婚。

坚守爱情

1930年6月，陈毅安的伤渐好。同年7月，心系革命事业的他就回到红军并担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攻打长沙战役前敌总指挥。1930年8月7日，在掩护军团总部撤退时，陈毅安遭敌机枪扫射，腰部中弹，不幸牺牲。

在陈毅安离开日子的日子里，李志强一直在家中待产。1931年1月底，她生下两人的孩子，并取名“昆明”。在期盼陈毅安回乡，一家三口能够团圆时，李志强经常将陈毅安之前写给她的54封家书找出来，并且反复阅读，并期待新的家书赶紧寄来。

在望眼欲穿的思念中，1931年3月下旬，一封由陈毅安寄出的家书终于到了李志强手中。但是，拆开信之后，只看到两张白纸的李志强，顿时就哭成了泪人。

因为按照陈毅安与李志强的约定，信中出现两张白纸代表他已经去世。陈毅安曾告诉李志强，“红军与敌人三天一小战，五天一大战，有谁能保证自己不受伤或者战死”，这次自己上前线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并强调万一自己牺牲了，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她，“反正，以后你要是接到了我的空白信笺，就说明我已经离开了人世”。

虽然有约定，但是李志强拿到空白信笺时内心仍无法接受。为此，她一边尽心抚养幼子，一边反复到长沙找显字药水查看是否有留言，并坚持给党组织写信，希望确认陈毅安的下落。1937年9月，李志强给延安八路军总部写信询问丈夫的下落，彭德怀很快回信：“毅安同志为革命奔走，素著功绩，不幸在一九三〇年已阵亡。”至此，李志强才最终接受陈毅安已经去世的事实。

虽然陈毅安去世了，但是他与李志强的爱情却没有因为生死相隔而消失。在之后的半个世纪，无论身处何地，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李志强始终带着那些承载着红色爱情的信笺。而那些充满爱的信笺不仅给了李志强坚强于世的力量，还将那份革命者的崇高爱情永远定格，供世人缅怀和纪念。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牺牲了无限远大的贸易前途，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为愚蠢的商界大傻瓜了”。在演讲最后，他从道德角度呼吁中西方联手一起消灭烟毒：“鸦片问题应当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处理。中国儒家的孔孟之道培养了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基督徒的良心一样。我们总不可忘记，有一项法则甚至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那就是永恒的上天的法则。这项法则按孔子的说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耶稣基督的说法是‘爱你的邻居如爱你自己一样！’这篇演讲得到了当时中外舆论的极高评价。有了这样的口才，唐国安想要说服政府部门为清华学校做点事，自然不会太难。

唐国安的眼界非常开阔。他出生于1858年，14岁时成为第二批留美学童，最初入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新不列颠中学，后来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因清政府中止留学政策，大学未毕业即回国。回国后，他在美商旗昌洋行做过翻译，1887年进入外务部，后来又护送留美幼童去美国，对外的世界了解得比较清楚。这就使得他在主持清华校务时能跳出传统的科举式教育的僵化模式，让清华一开始就在文明教育的轨道上奔驰。

唐国安：新官上任“四把火”

游宇明

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改称为清华学校，唐国安成为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

唐国安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上任伊始就烧了几把一般校长烧不来的火。他烧的第一把火是呈请外务部批准，撤消游美学务处，将分散于学务处、学堂、驻美监督处的招生、国内准备、遣派、留学监督诸权力统统收归学校，极大地减少了外界对清华事务的干预，确保了清华的办学自主权。

接着，唐国安又烧了第二把火，大力改革清华学制，第一，将原来的中等科5年、高等科3年，改回最初的中等科、高等科各3年，实行高等科文（文法）、实（理工）分班；第二，把中等科、高等科混合招生改为中等科统招，高等科插班招。第三，选聘学科牛人，狠抓课堂管理，使中

等科学生毕业可达美国高中一、二年级水平，高等科学生毕业可达美国大学一、二年级水平，学生赴美后可直接插入大学三、四年级，既省时间又省银子。

清华建立之初，庚子赔款退款常被袁世凯挪用，有时袁世凯一借就是20万银圆，学校办点什么事经常捉襟见肘，唐国安为此四处奔走，请求政府将庚款完全用于办学，使这一问题终获解决，这是唐国安烧的第三把火。此举对清华后来的腾飞意义不言而喻。

学校不是天上的云彩与月亮，它需要土地支撑，在执掌清华的短短时间里，唐国安烧的最大一把火是征地。他曾在一年之内两次扩充校园。第一次是1913年春，他请求政府将清华园西部的近春园划拨学校，得到批准；不久，为了让园内的水系流畅，他又请求政府将近春园西边的长春园东南隅划归学

校。两次扩充，增地480亩，加上先前购进的200亩，以及原有校园450亩，清华拥有的校园面积超过1100亩。这样的校区面积在21世纪的今天自然不算什么，但在民国初年大学规模普遍偏小的情况下，绝对是一种奇迹。

唐国安只在清华工作了两年半，1913年8月即在任上逝世，所烧的“四把火”却有口皆碑，他的治校成就至少跟两个因素有关。

唐国安善于与人沟通。有个例子可以从侧面证明其非同一般的口才。入清华做校领导之前，唐国安曾在清政府外务部工作。1909年2月1日至26日，清政府在上海主办了第一届万国禁烟会议，唐国安以清国参会外交代表的身份在会上作了一个8000多字的英文演讲。他先从经济角度阐述了鸦片贸易的不明智，说列强“紧紧抓住目前仅占清国对外贸易7.5%的鸦片贸易不放，却